

# 不灭的荧屏之光

文 / 张持坚



蓦然回首

1975年初春的一天傍晚,我下乡所在的黑龙江农场电影队的办公室,里里外外围了许多人。原来,两个担任放映员的上海知青王小峰和汪大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台电视机,要在这里试试能不能收到电视节目。

那时大城市已有一些人家有电视机了,尽管电视节目谈不上丰富,可回家探亲的知青看了仍羡慕不已,因为地处偏僻的农场的文化生活实在太枯燥了。小王和小汪刚从上海探亲回来,又听说离农场二三百里外的齐齐哈尔市也开始播放电视节目了,便怎么也坐不安稳了,非要弄台电视机来试试不可。消息一传开,电影队办公室很快“人满为患”,谁都想先睹为快,成为农场“首批看到电视节目的人”。无奈的是,办公室太小,进不了多少人就得把门锁死。一大群小孩在门外急得团团转,后来都爬到窗户上,眼睛紧贴着玻璃往里看。

那是台外壳为咖啡色的电子管电视机,放在一张办公桌上。办公室外的房山头上已竖起一根三四米长的木杆,木杆上拖下一根天线。电源打开了,荧屏上出现了闪烁的光亮,喇叭里传来了“沙沙”的电流声。那时我是农场的新闻干事,心想可不能“漏了这条新闻”。这时,一屋子人的眼睛都紧紧地盯着荧屏,很兴奋,也有点儿“紧张”。10分钟过去了,又10分钟过去了,尽管小王和小汪一会儿拧拧这个,一会儿又弄弄那里,可荧屏上仍然只是闪烁着灰白色的光亮,耳边响着的也依然只是“沙沙”的电流声。

“是不是天线太低了?”大伙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小王说:“有可能。”于是小王和小汪又匆匆跑到屋外房山头上,在原来的木杆上又接了一根3米长的木杆。就在这时,荧屏上忽然出现了一个模糊的图像,大家立即“哇”地一声欢呼起来。可那图像一闪即逝,还没等欢呼声消失,那已经有点看腻和听腻了的闪烁的光亮和单调的“沙沙”的电流声又“统治”了整个局面。

大伙自然不甘心,小王和小汪更是不死心,继续调整电视机的各个开关和东南西北地转动着电视机的方向。这时天已经黑透了,在大城市正是播放电视节目的“黄金时间”,然而,在这远离都市的偏远角落,一群渴求文化的年轻人,却怎么也接收不到电视节目……

屋里人着急,屋外围着的一大群农场职工的小孩子们更着急。隔着两层玻璃窗,实际上什么也看不清,连电流声也听不到,可他们不离开,他们不像知青,连电视机是什么模样也没看到过,怎么舍得离开呢?里面的人终于失去了信心和热情,“看来我们这里离城市太远了,收不到电视信号,还是等以后有了转播台再说吧。”没办法,大伙只得认账了,望着桌上既吸引人又恼人的电视机,无可奈何地走出了办公室。小孩们见大人们出来了,马上围了上来,想问问电视节目好看吗,可看到大人们一个个闷闷不乐的样子,也多少明白怎么回事,便也蔫蔫的,在大人后面四散了……

事隔10多年之后初秋的一天,已在新华社工作的我应邀和一批知青一起回访农场。我们乘坐的大客车开到离农场还有二三里地时,迎面开来一辆厢式轿货车,车厢里站着一个小伙子,肩上扛着电视摄像机,正对着我们这台大客车。陪同的友人说:“这是农场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你们回访的新闻来了。”待我们走下车,进了招待所的房间,那台“摄像机”又跟了进来,聚光灯打到了我的脸上,一位女记者的话筒伸到了我的面前:“你是新华社记者,请问此次重返农场有何感想?”

望着摄像机和面前的话筒,我竟一时语塞,当年“怎么也调不出电视节目”的情景顿时浮现在眼前,心里真是感慨万千,可喃喃地没说出话来……

此时,王小峰已是上海电视台的编导,汪大伟则挑起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的担子。当我们相聚在一起,说起当年调试电视节目的那个场景时,都禁不住感叹连连,既为那时乡村的闭塞和科技的落后,也为今日迅捷的变迁和处处蓬勃的景象……



往事难忘

1969年9月13日,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我们上海南市区小东门街道与唐家湾街道的“知识青年”乘坐同一列火车来到黑龙江省嫩江农场三分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年一轮回,每天在简单而重复中度过。劳动之余难免思念故乡,感觉时光难以打发。

此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1970年国庆来临之际,分场办公室门斗前的一幅毛主席画像因日晒雨淋,严重褪色,这有损于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为此分场办公室急于重新购置一幅新的毛主席画像。但“踏破铁鞋无觅处”,几位分场领导为此而一筹莫展。这时我的脑海中

闪过一个念头:也许我发挥绘画特长的机会来了。

我斗胆向分场领导提出:我用油画形式画一幅毛主席标准像。我此语一出,几位领导面面相觑,一脸惊愕,空气也好像凝固了。最终还是王文生主任开口说话了:小王,画毛主席像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可不能开玩笑啊!为了消除他们的疑虑,我把自己从小学三年级起到少年宫系统学画五年的经历告诉了他们。为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作画过程严格保密,“画室”窗户用报纸糊上。画像完成后,请领导审查,如合格就用,不合格我会妥善处置,不会造成负面影响。

第二天,青年干事徐有通知我:分场领导同意采纳你的建议,将办公室东头的会议室临时当作“画室”,窗户用报纸糊上,与外界隔绝,不准任何人进入。

想到已搁置画笔五年之久,又能重新拿起画笔,我心中一阵激动,于是开始筹划各项前期准备工作:首先将画像所需的各种油画颜料、画笔、调色板、画布等各种材料、用具开具清单,委托办公室宁海滨(人称老宁头)外出采购,同时去木工房定制画框。两天后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完成,所需颜料尽管不全,但主要的三原色还是买到了。

作画开始,我首先将画布钉在画框上,随后把画布反复涂上白色底漆。为确保毛主席画像的轮廓、五官位置绝对正确,我用

九宫格同比例放大的原理在画布上画上九宫格,用铅笔画出毛主席头像的轮廓,经与原画核对无误后,开始打底色。因这是我在农场第一次作画,又是一幅领导高度重视的画像,所以作画过程十分小心,每一次调色经反复多次确定正确后再画到画布上。由于油画不同于其他画法,在底色尚未干透时是不能往上涂色的,所以这幅画我足足画了一个多星期才完工,然后配上镜框,这时一幅高约1.5米的毛主席标准画像赫然竖立在我的面前。我退到窗前,离画像6米左右的距离,对照原画又仔细核对了各部位的比例、颜色之间的关系,确认达到预期目标,可以让领导来验收时才长长舒了一口气。

我把分场几位主要领导请到“画室”验收,紧张的空气又凝固了两分钟,随后几位领导异口同声地说:像!像!像!王主任笑眯眯地对我说:小王,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啊!

1970年国庆节前夕,一幅色彩鲜亮的毛主席画像挂到了分场办公室的门斗上。

随后根据分场领导的要求,我又为分场十字路口的语录塔画了一幅高约3米的《毛主席在军舰上》的大幅油画。

农场的各类往事历历在目,我要感恩在农场的十年中帮助我成长的各位领导,感恩伴我同甘共苦的知青朋友,感谢你们,并希望你们保重身体,度过美好的晚年。

王继良



放映员王小峰(左)和汪大伟在下乡农场的合影



人生驿站

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我最喜欢眺望飞速奔驰的列车,因为我对列车怀有浓浓的情结……

1972年12月,我从插队的江西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的一员,当时兵种保密没人知道,到了部队驻地才知道。

那是一个北风呼啸的冬夜,空中挂着一轮明月,冰冷的银光洒落在九江火车站月台上,数百名新兵齐刷刷席地而坐。不一会,我的双脚冻麻,双手冻僵了,但不敢发出一点声响。突然,“吭哧,吭哧……”一列浑身漆黑的铁皮闷罐车开了过来。“噢!怎么坐这车?!”大家都露出惊讶的神情。“上车!”面容严肃的带兵首长一声令下,大家顺着简易木梯鱼贯爬上列车。车厢里铺着稻草和芦席,弥漫着阵阵寒气,角落里的蜡烛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两天两夜的行程,外面零下十几摄氏度,车厢似冰窖。大家根本无法入睡,有的坐,有的躺,聊过去,谈未来。“到野战部队听说有人要去养猪的,那不成了‘养猪兵’吗?!”来自山区的小张边说边做喂猪的动作,逗得大伙哈哈大笑。“县武装部有人说咱

们这次当兵不是野战军,是修铁路的铁道兵。”消息灵通的小彭说。“管它啥兵啦!”在长江边长大的小魏站起来踩着冻麻的脚说:“当兵总归离不开扛枪站岗!要是当铁道兵,咱就为国家多建铁路,建好铁路!”

现在想起来,闷罐车条件实在太艰苦了,但大家激情燃烧,欢声笑语从未间断,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尤其是一位新战友小陈天生一副好嗓子,一天要唱几次歌曲《我为伟大祖国站岗》,每次高歌都令我们热血沸腾。然而最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后来有好几位战友在我们建设的襄渝铁路中不幸牺牲了……

列车抵达终点站鄂西北,遍野冰天雪地,回首望去,黑色的闷罐车在一片白色中分外刺眼,那一幕永远印刻在我的记忆中。

几年后,我从部队探亲加出差回上海,其间恰逢春节。我和妹妹及姑姑等坐火车去宁波老家,绿皮火车断断续续开了八九个小时,一路上,车厢内人挤人,站无寸地,连座位下也躺着人,空气浑浊不堪,更想不到的是中途姑姑竟晕了过去……旁人大叫,“快!旅客中有医生吗?救

人!”“有!”立刻从不远处传来一声女中音,拥挤的人们硬是拼命让出通道,让这位医生赶过来。经过施救,姑姑恢复了神志,旁边一位旅客还让出了宝贵的座位,最终平安到了宁波。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2017年金秋,我们全家带丈母娘登上“复兴号”去北京旅行。精致的布局、舒适的座位、柔和的灯光,汇成一股温馨的气息……列车缓缓驶出车站,不一会便加速到每小时300多公里的速度。4个多小时后,“北京站到了!”80多岁的丈母娘仿佛没够瘾,还坐在位子上,“这么快到了!也太神了!老头子活着时曾去过北京,他说要20多小时呢!”

是啊,贫困落后的中国已随历史的车轮蜕变,更富更强的中国正如“复兴号”昂首驶向新的远方!

王耀忠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母,关心父母的父母